

## 让“全民阅读”成为“全民悦读”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各地开展多种活动传递阅读精神，鼓励阅读习惯。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山西省晋城市洞头村，一场名为“习新语润心田”——在阅读中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理力量大型读书主题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大家通过写给总书记的一封信、晒晒“新时代新农民的新书单”等形式，分享阅读故事、畅谈阅读感受。（4月23日央广网）

当今社会，习惯于互联网时代畅游，有时间读书似乎成了一种奢求。孩提时，课本上颜真卿的那句“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座右铭。但在今天，虽然精神食粮不再匮乏，各类书籍品种丰富，应有尽有。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却很难再见到人人都爱读书的场景，读书的习惯都去哪儿了，引人深思。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年平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为13.43分钟，不到上网时长的三分之一。由此而看，读书问题尤值得高度重视。

“全民阅读”今年已是第五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全民阅读的倡导，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通过更多的读书，读好书，去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是全民阅读取得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的5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全民阅读热潮在中华大地蔚然成风。从2012年到2016年，我国成年人国民综合阅读率由76.3%增长到79.9%，“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一种自觉，营造出“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党和政府在提高国民阅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种报刊书籍日益丰富，图书馆等阅读场所日益完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700多个城市开展全民阅读活动，400多个城市建立了区域的阅

读节、阅读月，江苏、湖北、深圳等省市先后出台了地方全民阅读法规。特别是遍布各地的农家书屋更是为农村居民提供了阅读的便利和支持，共有60万个农家书屋推动11亿册图书进农村。2018年1月1日，公共图书馆法正式施行，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由是观之，全民阅读活动已在不同层面铺展开来，成为培养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索引。

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不读书，我们的内心世界就和纸一样单薄，唯有读书才能充实我们的学识与情感，让自己的人生更出彩，特别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抱着一个让自己人生出彩的梦。唯有读书，方可成就出彩。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人的一辈子，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整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当前，我国已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只要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建设书香中国便指日可待。换言之，理想因读书而丰满，多读书、勤读书才能凝聚起更加强大的推力，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铺就圆梦之路。喜欢读书，享受读书，珍惜读书的机会，让“全民阅读”成为“全民悦读”，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和生活方式。

广西南宁市 黄春景

## “不读盗版图书”应成为自觉行为

据报道，4月24日上午，涉案328万余册、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获盗版图书册数最多的案件在北京市三中院终审宣判。团伙8人中，主犯赵春广以侵犯著作权罪获刑6年半，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缓刑到4年有期徒刑不等。

这是一起严重盗版案件，涉案书籍达到328万册，而且窝点呈现一条龙作案手段，有专门盗版出版社书籍电子版的，有专门印刷的，有专门销售的。最可怕的是，盗版书籍很多涉及少年儿童内容，可想而知，其危害会是多么巨大。

打击盗版团伙，是维护知识产权的亮点，我们就是要向盗版说不，我们就是要让盗版不法人员没有生存土壤。然而，在打击盗版团伙的时候，还必须思考一个问题：盗版图书何以有着如此宽广市场？

一些人购买盗版图书的行为，助长了盗版的嚣张气焰。盗版图书有市场，才有了前仆后继的盗版违法人员，能够在盗版图书里获得利益，也就让一些人愿意铤而走险。就像报道中提及的一位业务人员，他发现盗版图书有价格低到了一块钱一本。可以说，盗版图书换来的是巨大利益。

在购买盗版图书的时候，很多市民并不是毫不知情的，他们明明知道是盗版图书，还是进行了采购。甚至有的市民专门去购买盗版图书。作为市民而言，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让“不读盗版图书”成为自觉行动。是我们“阅读盗版图书”的坏习惯，给不法人员提供了利益的空间。

市民需要知道的是，盗版图书的危害巨大。这不仅侵犯了他人利益，关键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读书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获取知识的，而盗版图书，由于没人审核，里面是错字连篇，影响了阅读的惬意。有的盗版图书还是低劣内容的简单拼凑，很多内容与事实不符。假如说，这类图书是购买给孩子看的，试问，阅读的结果是什么？不仅不会增加孩子的涉猎面，而且还会误导孩子们。最为关键的是，盗版图书为了节约资金，使用的纸张、油墨等等，都是最低劣的材料，对于读者的健康而言，也是一种伤害，尤其是对身体处于发育期间的孩子来说，危害就更大。

盗版图书盛行，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价格便宜，就像有的书籍一样，从不法人员手里批发的時候才是一块钱，经销商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读者也可以省了不少钱。这警醒我们的正规出版社，也要尽量放弃对利益的执着迷恋，尽量降低书籍的价格，让阅读书籍不为价格忧虑。当然，如何给出版社补贴，扶持文化发展，也是政府需要思考的事情。

“不读盗版图书”，应该成为市民自觉行为。

江苏省徐州市 郭元鹏

## 古建内的书店 温馨惬意

近年来北京将一些古建筑腾出来让位于书店，或建成读书空间，免费对市民开放，开启了“古建+书店”的全民阅读新模式，深受欢迎。（见4月23日中国新闻网）

位于北京地安门的雁翅楼，始建于1420年，是老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处著名地标建筑，于上世纪50年代因修路被拆除，2012年按原貌重新重建，2014年竣工，复建的雁翅楼虽然算不上原汁原味，但建在地安门原址，多少也沾上了古建的“地气”。2015年7月20日，一家24小时书店“中国书店”诞生于这座古色古香、金碧辉煌的古建里，延续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读书文脉。近3年来，“中国书店”通宵明亮的灯光吸引着来自京城各地的爱书人及外地游客，乃至于热爱中国文化的老外，络绎不绝地来这里淘书、读书。

中国书店是国内古籍领域的知名老字号国企，能挺进让人羡慕的老北京地标建筑雁翅楼，得益于政府鼎力支持，北京市西城区将雁翅楼交给中国书店使用，不收取一分钱租金，唯一要求就是24小时营业，并且不得经营与书籍无关的其他商品或服务，让雁翅楼充满书香和文化气氛，成为首都耀眼的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和城市文化地标。

把古建改造成文化阅读空间，北京可圈可点，雁翅楼书店并非首创，如2014年4月，位于西城区砖塔胡同口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万松老人塔院”被打造成公益性质的“北京砖塔空间”，专营老北京书籍，目前“砖塔空间”收藏着超过40000种北京的历史文献及老照片等，成为继书店、档案馆和博物馆三馆一体的免费阅读空间。另外还有位于西二环白纸坊桥护城河畔的北京金中都公园里的清朝宣阳驿站，于2014年9月被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对外免费开放。

古建变书店，堪称慧眼，值得点赞。读书需要氛围，古建内的书店更有历史文化人文气息，以古建为伴的书店或阅读空间，读者置身其中，身临其境，无疑更能享受和感悟

到书香的场景感。我国城市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古建筑资源丰富，有些古建尚未达到文物的保护级别，或者尚不具备旅游参观的功能，用于办书店或改造成全民阅读场所，堪称是最好的选择，活化了古建筑的利用，也有利于古建文物的保护。古建筑可称是历史传统文化的一种物质表现及显性形态，而自古至今，书籍则是文化传播及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古建与书店结合，堪称是读书文化“红花绿叶”的完美搭配。

据统计，在全国成千上万家书店中，目前24小时书店寥寥若晨星，昼夜不打烊导致成本增加，大多数24小时书店不盈利，许多在亏损经营，如雁翅楼24小时书店虽然免租金，但也不挣钱，中国书店总部每年要给予资金补贴。在实体店普遍不景气的窘境中，24小时书店的坚守尤为难能可贵，它点燃了守望文化与读书的“灯塔”，释放出推动全民阅读的热情。我们在赞扬这种责任精神的同时，也希望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帮助，政府扶持24小时书店就是扶持全民阅读，是必要的责任担当，雁翅楼书店模式已成表率与范本，值得各地学习与借鉴。

南京市雨花台区 尹卫国

## 打击盗版书有共识，还要有共治

拉来父亲、堂弟、大肆盗版市面上流行的儿童书籍，经鉴定，328万余册涉案图书为非法出版物或侵权复制品。4月24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赵某等8人侵犯著作权罪一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获的盗版图书册数最多、少儿出版物码洋（全部图书定价总额）最大的案件。（4月25日《北京青年报》）

盗版图书猖獗的危害，还远非如此。盗版图书为有效地抢占正版的市场，往往追求价格便宜。比如赵某盗版的一些图书，就可以以每本1.6元左右的价格，批发给个体工商户，其制作成本就会很低廉，往往粗制滥造、错误百出，还容易传播错误的知识，对读者造成不小的误导，影响价值认知。尤其是针对孩子的

图书，盗版不仅会影响孩子未来识字词汇的准确性，而且，劣质的印刷质量容易让孩子产生视觉疲劳，影响视力。为降低成本，盗版会采用不合格的纸张、油墨和胶水等，铅等重金属元素超标，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甚至是大脑发育。

由此可见，图书市场一旦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危害便是多方面而深远的。严厉打击盗版图书，不仅是维护作者、出版社的合法权益与权益的需要，也是捍卫良好出版市场秩序的需要，还是保护读者尤其是孩子身心健康的需要。对此我们并不缺乏共识，却缺乏共同行动。相关部门在宣传盗版图书的危害，在颁布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在出手阻击盗版行为，然而为了自己的利益算计，一些印刷企业仍在接受无合法手续的订单，一些书店仍在引入盗版，不少读者仍在一味追捧盗版，一些出版社甚至可能会互相盗版而无底气主张自己的权益……

在这种只知计较私利，而罔顾公共利益的局面下，又如何将盗版行为有效封堵？更不要说赶尽杀绝了。所以，打击盗版图书有共识还要有共治。在这方面，监管部门首先理应承担起重担，在加大法律法规宣传的同时，加大对盗版者、销售盗版者的打击力度，尤其要加强部门之间的联合执法，既要打击线下的盗版与销售行为，也要打击线上的盗版与销售行为，比如加强对电商平台销售图书的监管，加大对文学网站上传作品著作权合规性的监督。比如赵某等人炮制的盗版图书，小部分进了网店零售，绝大部分批发到图书市场，堵截就要双管齐下。

在监管部门之外，印刷企业也要守好职业与法规底线，不与盗版行为同流合污，否则极可能承担盗版的连带责任。出版社也要守好阵地，在保证自己的清白之身后，面对侵权行为，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同时，在图书定价上要遵循经济规律，合理定价，不宜以高昂的价格将读者变相赶到盗版商那里。电商平台也有责任把关，不给盗版图书提供销售空间。而读者诸君也应自觉抵制盗版，不因盗版图书价格便宜，而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网开一面。好书相当于好老师，从自身利益出发而购买盗版，将影响图书市场优质内容的长远供给。

成都市武侯区 何勇海

# 我与侯外庐、郭沫若等人的学术交往

——李埏先生口述

■ 仲伟民

（上接第5版）

李：有一次我去长春开会，回来路过北京，我去编辑部找田居俭。田居俭说，黎澍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说，没事就不打扰他了吧。所以我没有见过他。虽然我没有见过黎澍先生，但我看过他写的东西，我觉得很好。你知道有个人叫吴天颖吗？

仲：不知道。

李：吴天颖是北京经济学院的。我从长春回来，看到傅筑夫先生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就打听傅先生在哪里。吴慧说，我认识，我介绍你们去吧。他写了地址给我们，我们就去了。在傅先生家，我们碰到了吴天颖，他是傅先生的助手。我回来后对学校讲，傅先生的文章很好，可以请他来讲讲嘛。于是我们就请他来听讲，他在云大差不多10天的时间，给我们做了几次学术报告，并游览了昆明。他回去后，说要想办法回报我，于是他邀请我到经济学院。当时经济学院的规模非常小，傅先生搞了一个研究室，大概有十几个人，我给他们做了几次学术讲演，非常热烈。我在北京经济学院差不多待了三个月的时间。天要冷了，我就回来了。那时经济学院那个地方很荒凉，周围没有一个饭馆。

仲：还有一件事情，不知先生记不记得。先生曾经纠正了《资本论》翻译中的一个错误，郭沫若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

李：对，这封信就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仲：我复印了一份给您带来。

林：就在《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一文的末尾，一个注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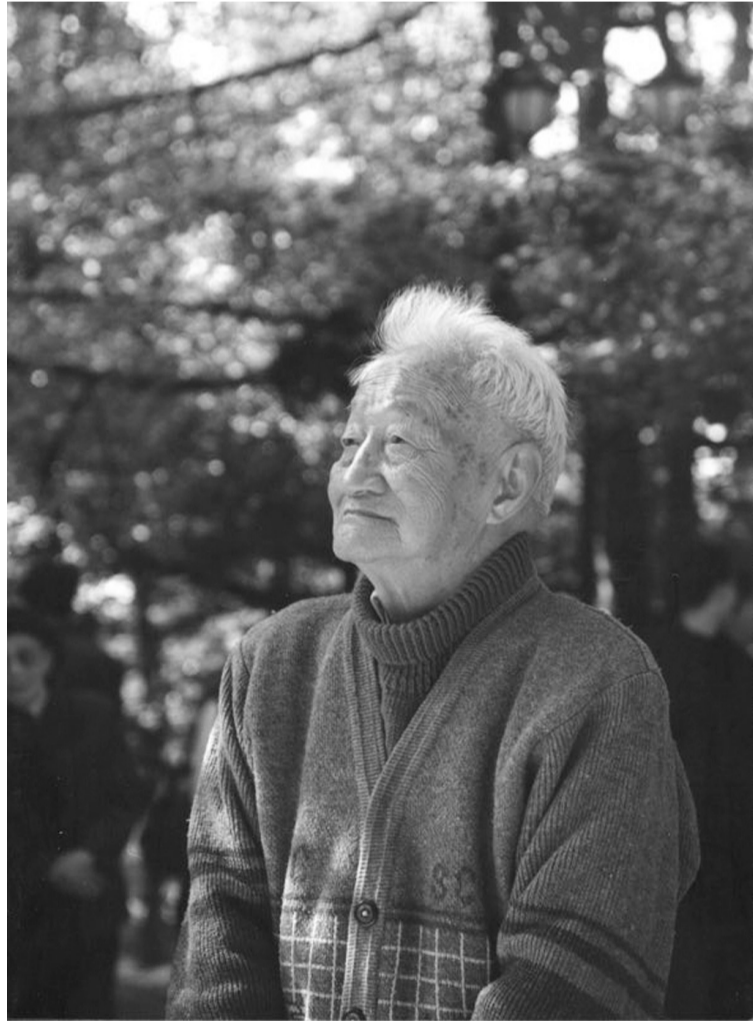
李：有个人叫刘贵武，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刘贵武在云南

大学做过助教，是楚图南的助教，那时楚图南是历史系的主任。解放后楚图南做了西南大区的文教部长，这个大区是邓小平负责的。刘贵武后来调走了，调到了历史研究所。解放前，这个人地下党员，思想很先进。楚图南对我说，你要多同这个人接近，他会在学问上思想上帮助你。我想他比我年轻，我是讲师，他是助教，他来帮助我？当时我不懂这意思。后来慢慢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大家大笑）。原来他是在这个（思想）问题上帮助我进步。有一次他到昆明来开会，对我们系主任说，李埏的这篇文章，郭沫若看了，郭老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其中李埏指出了《资本论》中译本的一个错误，郭老支持他。后来《历史研究》把郭老的信登出来了。我在自己的文集中，把这封信也收进去了。现在看来这不是什么问题，那时可是不得了的大问题。

仲：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李：马恩全集是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他们的东西有权威性，不好随便提意见的。我要纠正这个错误，于是我请经济学老前辈秦璋先生看，问是否正确。秦先生说，你仔细考虑了吗？不要冒失啊！他实际上并没看我的文章。在云大开《资本论》课程的戴钟珩教授说，到底是你错啊，还是他们错啊？他们中央编译局多少人在那里搞呀，还不如你呀！他们不支持我。我心里想，怎么办呢？秦先生问我，到底是中文本错，还是英文本错，你有把握吗？我说，我有把握。他说，我看你还是小心为是。当时我想，撞吧，反正是学术问题。于是就登出来了，想

李：后来得到了郭老的支持。这让我很佩服，说明郭老认认真真



看我的文章了，因为我把这个纠正放在最后一个注上。如果郭老不看完文章，就根本不可能发现这个注。

仲：后来您同郭老还有过来往吗？

李：之后我和郭老并没有直接交往，不过他的秘书给我写过信。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的另外一篇文章，题目是《梅花、元宝和一篇文》。郭老写过一个剧本，题目是

《武则天》吧？剧本里讲，上官婉儿要派一个人到长安去，给李贤通风报信，于是拿两锭银子给这个人作路费，给他一匹马快跑。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杂记，小短文，开玩笑的，我说此人到了长安，为什么呢？首先，唐朝规定，骑马要五品官以上。杜甫是七品，“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三十年在长安骑毛驴，他为什么不骑马？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级别

不够，就像现在坐小汽车一样，是有级别规定的。第二呢，他拿银锭买不到饭吃，因为唐朝还不用银锭，唐朝只能用绢，应该拿绢给他。银锭买不到东西，因为不流通啊，那时还没有货币。我这时有个学生王文成做关于白银的论文，我就讲这个故事给他听。就像现在在我们拿美钞到乡下买东西，买不到的，是不是？因为乡下不用这个钞票。所以我说这个人到不了长安，怎么办呢？只有让这个

人骑毛驴，再给他两匹绢。我把这篇文章寄给郭老，郭老的秘书回信说：郭老说了，按照你的意见，这个剧就不能演了，唐朝都是席地而坐，如果大家都席地而坐坐在舞台上，那么下面的人就看不见了（大笑），现在在做戏，不是考证历史。为此，郭老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件，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当然，这篇杂记，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发表。

仲：李先生给我们谈了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很有意思。

李：有些是笑话。你现在还在《历史研究》啊？

仲：是的，我还在《历史研究》。

李：高世瑜退休了吗？

仲：没有，她现在已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李：田居俭呢？

仲：他前几年调往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了。

李：时间过得真快啊！

林：和《历史研究》有关的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1983年在昆明召开的首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学术讨论会，影响很大，成为史学界的盛会。这次会议在昆明召开，李先生从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这次会议是庞朴发起的。他邀请南开、云大同《历史研究》一起讨论地主阶级的问题。解放以

来，大家都搞农民战争，研究农民，但对于地主阶级，很少有人研究。他倡议开个讨论会，我很赞成。我说，过去不讨论这个问题，是有顾虑，因为对地主阶级，只能骂，不能说好话。其实，哪个阶级开始的时候，都是进步的，是应该肯定的。相对于奴隶制，地主阶级是个新兴的阶级，代表新兴力量，应该肯定。但那时谁敢肯定地主阶级啊！庞朴说，不要紧，我们是研究历史问题。我说，你有这个胆量，我们就开。我给学校汇报，学校给了经费6000元，会议还没有用完。后来，《历史研究》还专门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林：会议是1983年开的，论文集是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第一篇就是李先生的文章《关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前言是诸葛计先生写的。

李：我那篇文章就是讲地主阶级的好话。现在诸葛计怎么样？听说他得了病？

仲：是这样。不过，经过治疗，他现在身体康复了。

李：如果你碰上他，请帮我带个好。我们可是老相识啊！

李：好，我一定转达。

仲：《历史研究》现在在哪儿办公啊？

李：在后海边上，鼓楼西大街，地安门附近。

李：我去过那个地方。附近那个门叫德胜门。

仲：今天李先生谈了一个多小时，太辛苦了！

李：孔夫子不是说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仲：临来看望，编辑部叮嘱我，一定要来看望李先生，这是我

来昆明最重要的任务。谢谢李先生，今天打搅您这么长时间。

李：欢迎啊，您一来，我门口就不是门可罗雀了（大笑）！